

周池会谈的意义与周恩来精神的弘扬

——从周总理的赞同与吸纳周总理的美德来看——

创价大学 高桥强

1. 序言

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305医院与第二次访华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下简称池田）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当时已76岁，且正在接受治疗，能与比自己小30岁的池田在夜里9点55分进行会谈，可见其情况之特殊。对于那次会谈的意义有许多评价。比如会谈将中日友好的未来托付给46岁的年轻人池田，再比如周总理高度评价了池田提出的1968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以下简称68年倡言）对恢复邦交做出的贡献等（王永祥2001）。

本论文就以下两点为中心进行考察。一，如果我们再次探讨周总理会谈之际的发言，能有什么样的新发现？二，会谈后，池田为促进日中友好在多种领域努力工作。该会谈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周总理与池田1968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在1974年周池会谈6年前的1968年，池田发表了恢复日中邦交的倡言。本章主要探讨68年倡言和周总理的直接关系。

从1960年代起，周总理通过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关注到池田及其作为会长的创价学会。1968年9月8日，在日本大学讲堂进行了该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总会（一万数千人参加），池田在会上的讲演再次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王永祥2001）。

池田发表68年倡言后，包括刘德有先生在内的驻日中国记者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发出电讯。刘德有提到：“我们作为记者的日常工作，把这一讲演的要点向新华社总部发回了参考消息。当然，总社肯定还收到了日本共同社和时事通讯社的有关消息。”（王永祥2001、pp27-28）讲演三天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1968年9月11日）介绍了68年倡言的摘要。

据担任周总理和池田会谈翻译的林丽韞女士说，就周总理和68年倡言的关系，可以指出以下两点（王永祥2001）。

一、我认为68年倡言很快传到了周总理手头。至于对倡言的感想，没有直接听总理说过，无法详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周总理对该倡言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二、当时的状况是中日两国还未恢复邦交，两国的战争还未结束。而在国际社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甚至没有自己的代表权。因此我认为周总理特别关注的是该倡言中的“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这一点。

据该女士说：“周总理每天都会认真过目日本新闻媒体的信息。”（王永祥 2001、p29）由此可知周总理很可能从日本的报纸直接阅读了 68 年倡言以及批评该倡言的报道。

1971 年 6 月，黄世明先生作为翻译参加了与公明党访华代表团的会谈，通过与该代表团的交涉，他就周总理和 68 年倡言的关系指出以下四点（王永祥 2001）。

一、接待公明党代表团时，准备的材料中就有 68 年倡言，池田的恢复日中邦交的主张和周总理所主张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基本方向，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二、公明党代表团对中方代表团提出了以下内容。除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注 1）外，还明确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军。能看出这些内容都反映了该倡言的主张。

三、因中方代表团不满足（二）的五项原则，（公明党代表团提议）在发表共同声明之际明确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谈判陷入了僵局。

周总理从中方代表团接到谈判陷入僵局的报告后，立即把中方代表团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都聚集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严肃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最为关键，台湾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关键，他们这点最明确，这不是很好吗。”周总理还指示，以公明党代表团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调，起草共同声明。

四、一般情况下发表共同声明后国家领导人才进行会见。但这次周总理在共同声明发表之前，先和公明党代表团会见，充分肯定并称赞他们的五项原则，并表示“相识虽晚，相知甚深”。

池田从该公明党代表团接到报告，将前述谈判内容进行了记录（池田大作 2006）。据该记录，周总理在与公明党代表团会谈伊始就说：“请向池田会长转达我的问候”，然后高度评价了公明党以往提出的有关日中关系的建议，并且如确认般一一列举了公明党主张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原则，。

从上述刘德有先生、林丽韞女士、黄世明先生的描述以及池田的记录出发，通过①1968 年 9 月 11 日的《参考消息》、②68 年倡言发表时的日本各大报纸、③1971 年与公明党访华代表团会见等可知，周总理对 68 年倡言形成了深刻的印象。

3 . 周总理和池田的 1974 年会谈

周总理和池田的会谈从 1974 年 12 月 5 日夜里 9 点 55 分起进行了约 30 分钟。参与者是周总理、廖承志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孙平化秘书长（同协会）、池田、池田夫人以及做为翻译的林丽韞女士。

据王永祥（2001）所述，周总理在会谈伊始就表现出对会谈实现的坦率心情。周总理说：欢迎您来。我一直想一定要和池田老师会面，能见到您很高兴。您是第二次访华了。您六月访华时，我因病重未能和您会见，现在病情好转，能见到您很高兴。

周总理对池田一再提倡必须发展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创价学

会和公明党都为这一目标积极奔走给予很高评价，希望今后中日双方还要继续努力下去。由此可见，在周总理的认知中，已存在且形成了池田为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提倡，以及基于该提倡致力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公明党。

如果我们再次探讨周总理会谈之际的发言，会发现周总理的发言体现了对 68 年倡言内容的共鸣和赞同，会谈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周总理的共鸣和赞同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点是，“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和您交往。”（池田大作 1998、p402）我认为这句话的背景是池田在 68 年倡言中反复强调建立日中青年友好关系，并且明确阐述了日本政府发挥的作用。前者的具体内容如下。后者将在下面第二点详述。

①“那场战争的伤痕在日中两国之间还未消失，但战争结束已经 23 年了，今天在座的诸位，绝大多数是与那次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代。活跃在中国的红卫兵等青少年也同战争无关。绝不能让未来承担两国前途的你们背负着过去战争的创伤。”（池田大作 1974、pp213-214）

②“当诸位最终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必须要携起手来，含着微笑为建设光明的世界而努力。”（池田大作 1974、p214）

③“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核时代，能否拯救人类，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这种跨国友谊。”（池田大作 1974、p214）

④“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变动。青年的特权是着眼于未来并发挥积极作用。而引领青年这样去做，正是为政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池田大作 1974、p224）

周总理的讲话可以理解为，我和您一样，十分关心承担国家前途的青年，希望您作为中日两国的代表，促进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此外，笔者认为周总理的讲话还表达了以下内容：您虽年轻，但因您提出的日本政府应采取的政策非常出色，我很珍视与您的交流。日本政府应采取的政策将在下面第二点详述。

第二点是“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池田大作 2021、p341）池田曾对这一发言提到：虽然我不是政治家，但周总理为什么向我提出条约问题呢？

（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授予仪式，池田大作致谢，1998 年 11 月 25 日）这是因为池田在 68 年倡言中明确表示了日本政府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①正式承认中国的存在；②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其在国际讨论场合登场；③广泛推进经济、文化交流等。以下是关于这三点的具体内容。

关于第一点，为正式承认中国的存在，有必要实现邦交正常化，因此从这个问题开始谈起。

①“首先我想谈谈日中邦交正常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1952 年已同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华条约，因而日中讲和问题已经解决。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无视中国大陆七亿一千万民众，似乎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唯心论。”（池田大作 1974、pp217-218）

②“只有当各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共同利益，并最终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时，邦交正常化才具有意义。因此，就日中邦交而言，其对象的实体也应当是中国七亿一千万民众。”（池田大作 1974、pp217-218）

池田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非常重视民众的存在，这点和周总理的“以民促官”政策一致，因此可认为他得到了周总理的共鸣和赞同。

下面介绍迈向邦交正常化的方法论。

①“关于日中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按照过去那种所谓归纳法的办法，如企图通过小手小脚的外交解决细小的问题，最终恢复邦交的话，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最终也会失败吧。”（池田大作 1974、pp218-219）

②“我主张不如一开始就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共识，坚定大局、基本方针路线，然后再涉及细节问题。这种演绎方法是解决问题的直接途径。”（池田大作 1974、pp218-219）

池田主张的方法论具体、可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可以认为周总理向池田托付了促进未来的日中友好关系。

下面是在推行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如何看待日台美关系的问题。

①“当然，（日本政府）这样接近中国，台湾当局和美国一定会表示相当强烈的反对。但我们绝不会仅仅因为接近中国就与台湾和美国分离。当前最需要的是两者之间的桥梁。我呼吁日本应承担起这一角色。”（池田大作 1974、p219）

②“要等到美国政府和国民对中国采取友善的态度，一般认为还是很遥远的。相比之下，战争的危险却日益逼近。考虑到核战争的威胁，必须要尽快让这两个大国和解。可承担调解任务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池田大作 1974、p220）

由此可见，池田的考虑很周到。“两者之间的桥梁”、“两个大国的和解”、“中间调解任务”均表现出池田立足的中道主义（注2）。此外，池田对1968年左右国际形势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的局势相似，可见池田的先见之明。

下面是第二点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内容。

“日本应积极推进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把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实际上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现状，在任何人看来，都必然会说这是联合国的重大缺陷。解决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池田大作 1974、p224）

此处还体现出池田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及稍后介绍的世界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内容。

下面是第三点广泛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

①“日本政府对日中贸易的态度如下：只听凭财界的一部分人，不仅采取完全消极、旁观的态度，而且坚持中国所反对的政经分离，并出于对美国的追随主义，严格遵守巴黎统筹委员会禁运商品项目等各种限制。其背景是美国敌视中国，以及日美安保条约把中国当做最大的假想敌。”（池田大作 1974、pp226-227）

②“我呼吁政府首先要宣布废除这一‘吉田书简’（注3），遵守贸易三原则（注4），一步步朝着扩大贸易的方向坚持不懈地努力。”（池田大作 1974、p228）

池田对日中贸易额的认识，以及他对吉田书简和日中贸易三原则的处理态度，都表示他考虑得很周到。当谈到邦交正常化问题时，人们往往关注克服外交关系的难题，但由于池田重视两国民众的存在以及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他的考虑扩展到经济、文化交流领域。

第三点是，“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还不富裕。还要努力。其结果应对世界做出贡献。”（池田大作 2021、p344）这句话以下述池田在 68 年倡言中的主张为背景。池田强调中国问题才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日本应立足于世界，不仅为了日本，而是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为了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后者是池田世界民族主义的内容（注5）。笔者认为周总理对该主义表示赞同。具体内容如下。

①“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建设的进程中。虽然有着能制造核武器等极其先进的一面，但总体产业水平很低。（略）以前曾吸收苏联的技术，但自中苏对立以来已经中断，几乎是自行发展的。仅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尊心很强，有点高傲，但内心毫无疑问还是期待发达国家的技术的。”（池田大作 1974、p228）

②“‘中国问题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略）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来看，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触及的首要根本问题。”（池田大作 1974、pp211-212）

③“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民族不能像过去那样是唯利是图的集团。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为了和平、繁荣、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做出贡献，才能称得上新世纪有价值的民族。我再次呼吁，现在正是日本立足于这一世界视野，为亚洲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特别是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即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参加联合国、促进日中贸易而倾注全部努力。”（池田大作 1974、p231）

第四点是“中国绝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池田大作 2021、p344）这是因为池田在 68 年倡言中指出，从毛泽东主义、传统思想及现状来看，中国不可能直接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具体内容如下：

①“在进入具体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义，以及中国是否是一个侵略国家。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保守派人士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侵略性的危险国家，所以要加强日美安保体制，不要过多与中国交往。”（池田大作 1974、p215）

②“毛泽东主义，与其说是马列主义，不如说本质上更接近民族主义。另外，我认为它继承了东方传统的精神主义血液，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燃烧着‘中华’自豪感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烈。”（池田大作 1974、p215）

③“对外国的势力扩张也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观点。而且，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和经济建设阶段来判断，也不可能直接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池田大作 1974、p216）

第五点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对世界是重要时期。要彼此以平等的立场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池田大作 2021、p344）这是因为池田在该倡言中提出了以下主张。基于上述世界民族主义，必须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公正地对待像国际社会异端儿般的中国，为了驱散笼罩今日亚洲的战争的残暴与贫困的阴云，必须以日本、中国为轴心，全体亚洲人民互相帮助、彼此守护。下面是具体内容。

①“如果不让这个被当做国际社会异端儿似的中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公正地交往的状态，那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池田大作 1974、p212）

②“我想说，只有当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全体人民开始互相帮助、互相守护时，才能驱散笼罩在今日亚洲的战争残暴与贫困的阴云，希望与幸福的阳光才会普照大地。”（池田大作 1974、p214）

③“不过，从国际社会动向来看，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同任何国家和睦相处。”（池田大作 1974、p214）

4 . 周总理的人格美德与池田的“世界市民”的三大要素

综上所述，周总理的共鸣、赞同和启示，成为池田后来促进日中友好行动的起点。

例如关于前述第二点“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池田作为一名民间人士作出了巨大贡献（孔繁丰、纪亚光 2006）。1974 年当时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政府（三木武夫首相）以不想恶化与苏联的关系为由，反对写明“反霸条款”。池田在 1975 年 4 月第三次访华前后，还会见了福田赳夫副首相，传达了自己主张缔结条约的信念。并转达了访华期间邓小平关于中方反对霸权和缔结条约的立场。通过池田的转告，日本政府要员及时了解到中国政府的态度，4 月 24 日双方又重新开始缔约谈判。可见，池田第三次访华具有重大意义。

又例如前述关于第四点“中国绝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池田在中国大学演讲中多次提及传统思维方式，尤其是关于和平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人为坐标轴的“通过个别看普遍”的人类观（1980 年北京大学演讲）、“尚文”思想、墨子的和平思想和行动主义（1984 年北京大学演讲）、中庸所见中国人本主义（1992 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基于人本主义的等身大思维方法（1994 年深圳大学演讲）等。此外，为真诚回应周总理的赞同，1989 年中国国内的某一事件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恶化时，他于次年 1990 年率领大型代表团第七次访华，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中国的现状并不危险。（孔繁丰、纪亚光 2006）

虽然池田和周总理会谈在 1974 年 12 月 5 日只有一次，但是如前述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重视民众的存在，期待日中友好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所以可以说周总理给池田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周总理的人格美德。值得注意的是，池田通过宣扬从周总理所接受的以下三点人格美德，明确了

日中青年应该共同追求的人物形象，挑战并促进了友谊的建立。

这一行动的背景与 68 年倡言的感受之一紧密相关，即能否拯救核时代的人类取决于能否建立超越国界的友谊。甚至能感觉到是对周总理“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和您交往”这句话的真诚回应。

（1）周总理的人格美德

第一点是作为“为人民服务”哲学实践者的周总理（王永祥 2001）。池田高度评价周总理的人生态度，且一有机会就向广大青年阐述。比如，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对周总理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受感动。尤其最感人肺腑的是，总理毕生都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们用下面的歌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王永祥 2001）

他还讲述了以下关于周总理“爱人民”的故事。在我会见周总理两个月后，即 1975 年 2 月，总理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刚结束，总理躺在手术台上将主治医生叫到身边，指示说：“我们必须了解云南锡矿工人肺癌的发病情况，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快去吧。”总理在手术台上仍然关注远在云南的工人们健康，这充分表现了总理对民众的爱。”（孔繁丰、纪亚光 2006）池田称赞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态度，并希望将其铭刻在年轻人心中。

又有一次，池田阐述了周总理“为人民”的思想是多么深远而广泛。总理的“为人民”并不局限于中国人民。1962 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访华时，团长对周总理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代表团表示衷心感谢。总理立即说：“在日本最受压迫、最困苦的人们来到中国，我若不会见你们，就不是中国总理。”对总理而言，“人民”绝不只是中国人民，他没有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别看待，作为一个人，他竭尽最大诚意。（孔繁丰、纪亚光 2006）

周总理“对人民的爱”深远而广泛，池田对身为领导人的周总理进一步如下评价，周总理的一生贯彻了“为人民”和“只为人民”。总理是所有领导者模范中的模范，是佛教中“菩萨”的形象。因此，我想大声呼吁：“年轻人，向周总理学习！”总之，以有限的人生全心全意为民众持续奋斗，这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奉行的伟大哲学。我对此深信不疑”。（孔繁丰、纪亚光 2006）

作为教育家，池田进一步将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拓展到人本教育领域，向青年们发出了如下呼吁：为他人、为社会而活是做人的基础。为他人竭尽全力，实际上也为自己开辟了道路。不顾他人，实际上也会伤及自身。（孔繁丰、纪亚光 2006）

第二点是作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体现者的周总理（1991 年澳门大学演讲）。

池田以培养世界市民为目标，希望通过教育来形成“人类意识”，为此他不断探究。作为这项探究的一部分，他对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赋予了

以下现代意义（池田大作 1996）。①“仁”是人本主义、人道的觉醒，广义上可以说是人类之爱的觉醒。②“义”是指克服利己主义。世界迎来了一个转换期，要求我们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同时，必须要超越本国中心主义，以“人类利益”、“人类主权”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市民的条件恰恰在于超越且克服这种利己主义。

③“礼”是承认他人的存在，尊重他人。世界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集合体，各自都保有独自的文化并构成其身份核心。认识到以上内容，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是和平共处的基础。

④“智”是指智慧。当今，世界上国际争端此起彼伏，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问题堆积如山。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僵化的观念，涌现出灵活新鲜的智慧，并将之汇聚起来。

⑤“信”即诚实。化不信为信，化反目为理解，化憎恶为慈爱，其根本毫无疑问就是“诚实”。用计谋或手段无法耕耘信赖这一友谊之地，为使世界彼此敞开心扉，“信”是绝对要求。以上是将“部族意识”陶冶为“人类意识”的重要因素。

池田在赋予“五常”新的理解时，提起了非常自然地体现“五常”美德的代表人物周总理。身患重病不惜生命与池田会面的周总理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五常”，他对会见时的印象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是在周总理逝世的前一年，即 1974 年 12 月第二次访华时拜会他的，周总理的举止言谈充满了严于律己的精神。

当时，他正在养病，是在北京市内会见的。尽管他重病在身，却特意到门口迎接、送行，那礼节使我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会见的房间也朴实无华。

周总理在坦率谈到‘中国现在的经济并不富裕’的同时，展望了世代相传、平等互利的友谊。我从中窥视了以和为贵、自我控制的谦逊之美，及贯彻信念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有鉴于此，我在创价大学种下‘周樱’和‘周夫妇樱’，以缅怀总理。”（池田大作 1996、pp337-338）

池田经常称赞作为“五常”体现者的周总理，特别是对他身上体现的“信”也就是“诚实”给予了很高评价。“诚实”贯穿了周总理的外交姿态。无论大国小国，他的态度从未改变。对所有国家一律示以尊重，以礼相待。对来访的外国宾客，周总理常常表示：“不要只看中国的优点，也要留心不足之处”。这种真诚，谦逊体现了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就连敌人也对他钦佩不已，以至渐渐变成了朋友。（王永祥 2001）

池田曾说过“佛法的究极在于诚实，它属于更高维度，包括勇气、正义、慈爱、友情及理念，”（创价学会指导集编辑委员会 1976、p208）可见他多么重视诚实。从此意义来说，池田对以下周总理的话产生极大共鸣。“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圣教新闻》2007 年 12 月 4 日）

第三点称赞了周总理“共生道德风尚”形象的人格，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共生、相互支持、共同繁荣的心愿。”（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

池田曾与曾在周总理手下工作的韩叙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面，听取了周总理的小片段，深受共鸣，进行了如下描述。例如迎接外国宾客时连及其细小的地方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不忘和专机的乘务员打招呼。自己无论多么疲惫也不会在人前展现出来，反而如果部下因为疲惫而打瞌睡，则让他继续安睡的那种温暖。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以严肃和责任感为后盾，仿佛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脑海中。对自己的亲属及身边人，绝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名义获利的这种严格和公平等等。（池田大作 1996）

此外进行了如下评价：“顾大局也不忘细节，内里是秋霜般的信念，外表洋溢着春风似的笑容，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人的心为中心。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和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经常温暖而公正地注视着民众这一大地的这种卓越人格，体现了鲁迅的呐喊‘革命并非是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池田大作 1996、p270）

池田认为，周总理的这些行为是由“共生道德风尚”推动的，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相互支持、共同繁荣，建立在和谐而非对抗、团结而非分裂、‘我们’而非‘我’的基调之上。”（池田大作 1996、p270）他称赞这些言行是其绝佳体现。

对于周总理非凡的“共生道德风尚”，池田经常回忆起周总理对他说的话，就是1974年会见时对他说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池田对此有如下感怀，总理的愿景在追求“和谐”与“共存”的当今社会更加熠熠生辉。（《圣教新闻》2008年12月4日）

对于“共生道德风尚”，池田认为这种精神源于中国思想的精髓“天人合一”论（季羨林、蒋忠新、池田大作 2002），它也与“大同”思想相通，“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梦想、理想社会和宏伟的乌托邦。（池田大作 1996）

“天人合一”论意味着，天道与人道在其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类的心性具有天的品质和美德。池田从佛教的“依正不二”论的观点分析“天人合一”论并得出如下见解。佛教是把大宇宙、大自然与人的生命关系当作“依正不二”论而展开的。作为“依报”的环境和作为“正报”的人的生命，在其根本上是“不二”的；而在现象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则作为“而二”显现出来。表现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哲理，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天人合一”论异曲同工。（季羨林、蒋忠新、池田大作 2002）

池田还读到追求“大同”思想的谭嗣同的以下内容：“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他说从其纯粹性和普遍性中看到了“共生道德风尚”的一个典型。（池田大作 1996）

作为“共生道德风尚”的绝佳体现者，周总理的言行在外交方面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池田称赞周总理为巧妙“连接人心之人”，且有如下论述。中国的古话说：“交人交心，浇树浇根，”重视人心，抓住人心——这表明周总理是真正懂得政治的人。无论是什么国家、民族，甚至是对立者，周总理均具有予以团结之力量。遇到难

题时，他总是首先打开彼此的心扉，以诚实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予以解决。（孔繁丰、纪亚光 2006）

池田关注周总理的连接人类的“智慧对话”，并称赞如下，“最重要的是心灵相通”，“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心与心就能团结在一起，任何事情讨论到最后都能得到解决。”这是在全世界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周总理的信念。（《圣教报纸》2009 年 12 月 2 日）

池田还把自己亲身体验的内容和周总理的“智慧对话”相关联，发表了如下感想：1974 年 12 月 5 日，周总理不顾自己的病体像慈父般迎接比他年轻 30 岁的我，那个真诚的身影已铭刻在我的生命里，且永不消逝。周总理在和我的谈话中，也传递了中日间不动摇的和平友好的愿望，并且展望了所有国家平等互助的时代。作为一名民间人士，我掀起了连接文明、人类对话之波澜，周总理的心永远闪耀在我心中。（《圣教报纸》2009 年 12 月 2 日）。

（2）池田“世界市民”的三大要素

池田曾列出世界市民所要求的三大要素（1996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演讲）：①不恐惧，也不拒绝人种、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是尊重和理解，并视此差异为成长源泉的“勇敢之人”；②深刻认识到生命相关性的“智慧之人”；③无论远近，对在远处受苦的人们都能给予关怀提携的“慈悲之人”。（池田大作、顾明远 2012）

池田将上述“智慧”、“勇气”、“慈悲”作为佛法之世界观，基于其相依、相关性的原理，将三者间的关系阐述如下。（池田大作 2004）

①当我们察觉佛法生命的关联性时，就会对他人产生同理心。由于佛教认为“智慧”与“慈悲”的行为相关，因此它鼓励基于对“生命”的深刻同理心来培养“智慧”。

②佛法所说的“慈悲”，绝不是试图强迫、压抑好恶这种人的自然感情，而是即使是讨厌的人，也能成为对自己人生有价值的、深化自己人性的人。佛法就是呼吁人们要醒悟这种可能性。这正是“智慧”的重要性。

③“我能为他做什么？”从这种真心关怀他人的“慈悲”之心中，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智慧”。

④佛法教导我们，人人心中皆潜在着“善性”与“恶性”。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对方具有“善性”，并决心去发现它。这种“勇敢”行动的坚持之中脉动着“慈悲”。

以智慧、勇气、慈悲这种动态的视角看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世界市民的存在是多么重要。

佛法中有“主、师、亲的三德”论。“主德”是指“守护众生”的力量，也就是决不让任何人堕入恶道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会给人勇气；“师德”是指“引导众生”，师德中闪耀着引导众生走向幸福的“智慧”；“亲德”则指“培育、慈爱众生”，亲

德中蕴含着严格且温馨的“慈悲”。基于“责任感”、“智慧”、“慈悲”三德并付诸行动的人，就是“菩萨”。（池田大作、洛克什·钱德拉 2005）

池田从“三德”的视角更进一步展开了世界市民的三大要素。也就是说，“勇敢之人”与平等守护众生的“主德”相通；“智慧之人”与引导全面人格促使众生绽放生命之花的“师德”相通；“慈悲之人”与将众生如自己子女般同等慈爱、并将众生培育成同自己同等高度的“亲德”相通。因此，世界市民的人生态度，正好与基于“三德”的人生态度相符合，也即“菩萨”的行为。

迄今为止，池田以国际创价学会为中心，致力于诸如废除核武器及地球环境问题等议题。以创价大学、创价学园等教育机构以及民音、富士美术馆等文化机构为中心，为了世界和平以文化、教育交流的方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友谊。池田针对以上议题也用“三德”的视点予以以下阐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都是在发扬“主德”的实践。另外，孕育“师德”的是“教育”，因为“文化”能耕耘及滋养人心，所以是“亲德”。（池田大作、洛克什·钱德拉 2005）

上述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态度，正是一种实践“菩萨”的体现，这与以“三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即以守护众生的责任感、勇气为支撑的“主德”、闪耀着引导众生智慧的“师德”、以慈爱众生的慈悲为支撑的“亲德”。另外，从世界市民三大要素的视角来看，可以说尤其是与第三要素即以“慈悲之人”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全部一致。

如果我们将周总理所体现的“五常”也即“仁、义、礼、智、信”与世界市民的三大要素进行比较，会发现人类爱觉醒的“仁”与第三要素的“慈悲之人”相通，超越本国中心主义、追求全人类利益的“义”与第三要素的“慈悲之人”相通，承认异文化的存在，理解并予以敬意的“礼”与第一要素的“勇气之人”相通，此处可以窥见作为伟大世界市民周总理的一个侧面。作为解决诸多全球问题的灵活而新鲜的智慧之一，池田经常提出佛教的“缘起”。缘起即“共生”，这与世界市民的第二要素，即知悉生命相关性平等的“智慧之人”相通。

周总理行为中脉动的“共生道德风尚”与“天人合一”论、“大同”思想相通，它体现在周总理睿智的对话中，仿佛他知道现象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与世界市民第三要素“智慧之人”相通。

5 . 结论

如果我们再次探讨周总理会谈之际的发言，就会发现周总理的发言体现了对68年倡言内容的共鸣和赞同，会谈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周总理的共鸣和赞同尤其是体现在池田所强调的以下五点：①建立日中青年友好关系，②日本政府为邦交正常化所采取的政策，③中国问题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④世界民族主义，⑤中国绝不是侵略性的国家。

综上所述，周总理的共鸣、赞同和启示，成为池田后来促进日中友好行动的

起点。其中通过弘扬周总理的人格美德，明示了日中青年应该共同作为目标的人物形象，挑战并促进了友情的构建，这一点值得关注。

虽然池田和周总理会谈只有 1974 年 12 月 5 日这一次，但如前所述因为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且因重视民众的存在并期望日中友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所以对周总理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挑战的背景存在着 68 年倡言的一个主张，即在核时代的今天，能否拯救人类，关键是看能否建立超越国界的友谊，此处甚至可以感觉出是对周总理说的“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和您交往”的真诚回应。

上述池田所宣扬的周总理的人格美德满足了他提倡的世界市民的三大要素。即，第一点“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实践者满足了作为世界市民第三要素的“慈悲”之行动；第二点“五常”的体现者满足了第一要素尊重差异的“勇气”、与第三要素的共生思想相通的“智慧”及第三要素“慈悲”之行动；第三点“共生道德风尚”所象征的人格满足了第二要素知晓生命的相关性之“智慧”。

对于池田来说，周总理可以说是满足世界市民的要素，贯彻其生存方式的“世界市民”教育下典型的理想人物形象。周总理的精神将与池田的“世界市民”教育的发展共同发扬，并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

（注）

（注 1）日中邦交恢复三项原则：（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日台条约（日华和平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止。（《岩波现代中国事典》岩波书店 1999 年 p 992）

（注 2）68 年倡言没有详细叙述中道主义。只提到它源于佛教色心不二的哲理，基于此的行动方式是中道主义。同年 12 月，池田还在向学术杂志《月刊亚细亚》投稿“对日中正常化的倡言”一文之际，在该倡言中提及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中道主义。

（注 3）吉田书简的内容：前首相吉田茂在 1964 年访问台湾后写信给蒋介石的秘书（私人信件），表示不再使用输出入银行等政府资金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68 年倡言有详细叙述）

（注 4）日中贸易三原则：即政府间协议、民间契约、个别考虑这三点（《岩波现代中国事典》同上 p 998）。

（注 5）68 年倡言没有详细叙述世界民族主义。不过同年 12 月，池田在向学术杂志《月刊亚细亚》投稿“对日中正常化的倡言”一文之际，在该倡言中提到“世界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理想是全人类的共存共荣，而不是为了一国繁荣而牺牲他国。”

参考文献

池田大作（1974）《中国的人类革命》每日报社
池田大作（1996）《21 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圣教报社
池田大作（1998）《我的世界交友录Ⅱ》读卖报社
季羨林、蒋忠新、池田大作（2002）《且说东洋智慧》东洋哲学研究所
池田大作（2004）《去往希望世纪》鳳書院
池田大作、洛克什·钱德拉（2005）《且说东洋哲学》第三文明社
池田大作（2006）《新·人类革命（第 13 卷）》圣教报社
池田大作、顾明远（2012）《和平桥梁》东洋哲学研究所
池田大作（2021）《新·人类革命（第 20 卷）》圣教报社
创价学会指导集编辑委员会（1976）《创价学会指导集》圣教报社
孔繁丰、纪亚光（2006）《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永祥（2001）《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